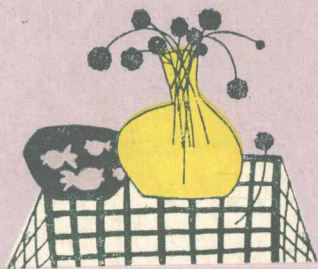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杜鵬程散文選

DUPENGCHENGSAWENXUAN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杜 鵬 程 散 文 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杜鹏程散文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0千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613-0246-0
I·29 定价：1.80 元

目 录

神坛村凭吊	(1)
雷北记事	(5)
致潘旭澜	
——书信11封	(9)
初写新闻稿	(33)
王震将军片断	(38)
歌剧《帕丽扎特》	(50)
我的心愿	
——《杜鹏程小说选》	
前言	(59)
《绿州之恋序》	(64)

读鲁迅先生书

——并怀念冯雪峰…… (69)

向军人献上我心中的歌… (76)

一条“电讯” …… (84)

彭总的画像… (93)

古城寄语

——致莫伸… (98)

记一位老作家

——田景福和他的

小说… (105)

新诗民族化的锐意追求

——读《长歌行》 …… (110)

致编辑的信… (118)

出书杂记… (122)

痛悼丁玲同志… (127)

传说及其他

——少年记忆片断… (133)

《从采访到写作》

前言… (138)

洋溢着朴素与自然的

美… (143)

读《司马迁的传说》 …… (149)

后记… (158)

神坛村凭吊

浙江，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众多。以义乌县来说，就出过陈望道、冯雪峰、吴晗，听说大诗人艾青的家乡也在这不远的山区。

人杰地灵。

6月初，义乌县举行冯雪峰学术研究会，全国各地去参加的人挺多。会议期间，大家分批到冯雪峰出生的神坛村去凭吊。一行数十人，有丁玲、唐弢、汪静之、陈明等白发苍苍的老一辈作家，而更多的是中青年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他们，千里迢迢地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来到这小小山村。

小山村，当初只有两三户人家，现在发展成十来户人家了。群山环抱，树木丛生，稻田片片，溪水绕村而过，显得异常安静与朴素。

今天，远方来了客人，这在神坛村是一大盛事；不仅本村的人衣着一新，周围的村庄的人都拥来了。男女老少，全都严肃地思索着，交谈着。去年收成好，农民收入倍增；今年庄稼整齐茁壮，丰收在望。但是，人们崇敬的雪峰同志，却看不到他为之牺牲奋斗换来的日益美好的生活，这使人黯然神伤！丁玲同志，对这小山村，对这里的诚朴的农民，都充满了感情。她和大伙儿热情而亲切地交谈着，又跑前跑后地去看雪峰生活过的地方，写作的陋室以及当年被捕的地点。然后，她满怀深情地和一位76岁的老太太在雪峰故居前摄影留念。这位老太太——雪峰同志的妹妹，身体单薄，双目失明，那灰黄的脸上流露出刻骨铭心的悲哀！她上了年纪，家里缺劳力，至今生活依然艰难！她的家乡方言，我听不懂，只能紧握那双干枯的双手，来表达我难以言传的复杂感情。

我望着这个小山村，望着这严肃而深思的人群，心里反复琢磨：雪峰同志就在这儿生，这儿长，在这儿耕耘，在这儿劳作。这里的土地培养

了他，这里的人民哺育了他，而他这坚韧不拔的革命者，也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全都献给了他们。你看，简陋的小楼上是雪峰同志的书房，有好几年功夫，他曾在豆油灯下通宵达旦地秉笔直书，以期描绘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能够出现人间。但是作品尚未完成，稿子就被特务抄走付之一炬。当时，他穿的灰色衣裤，是翟秋白同志去苏区前留在鲁迅家中的。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达上海，鲁迅先生心情沉重的亲手把翟秋白的遗物交给他。如今雪峰回到穷乡僻壤，但心中总是深深铭记着早已不在人世的鲁迅先生和牺牲了的烈士。

1941年，雪峰同志在这里被捕，特务们穷凶极恶，大声吆喝。他把桌上的书稿堆到一边，又拉拉长衫，从容地对家人说：“我走了，不要挂念。”头也不回，无所畏惧地走去了。

我望着这小山村，望着这严肃而深思的人群，心里反复琢磨：雪峰这深知劳动艰辛和民间疾苦的人，在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党的怀抱，在长征途中历尽人间艰险；在敌人文化围剿中，他是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奋不顾身的战士；在敌人监狱里，他英勇无畏，置生死于度外……这走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对中国革命

和我国新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战士、诗人、作家和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有近20年岁月，在自己亲手创立的世界上，受尽了屈辱与折磨。但是崇高的信仰的火，始终都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念念不忘的是回到党的队伍里，他念念不忘的是祖国的安危祸福……

如今，他早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人民怀念他，朋友惦记他，——他，虽死犹生，活在人们心中。是的，我们只有一抬头，就看见走在我们前头的雪峰同志的忠诚倔强而坚毅的身姿。这身姿给我们以力量，给我们以勇气，使我们在新的征途中奋然前进。

我感激这培养了无数英雄的江河大地，我感激这哺育了众多战士的勤劳的人民群众……

1983年4月10日于西安

雷北记事

今年开春，我又到大荔范家公社雷北大队去了。这里的干部、群众，我很熟悉，到了这个村子就象回到家乡一样感到亲切。而且，这里群众的不断前进、不断创造精神，总使我深受教育。

雷北大队，当初土地瘠薄、生活贫困，连吃水都很困难。从1970年开始，干部、群众经过8年含辛茹苦的不懈奋斗，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使这里变成了林木茂密、水渠纵横、粮棉高产和五业兴旺的旱原绿色明珠，——变成了陕西省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单位。1979年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多年来，人们不远千里到这里参

观，赞叹群众用血汗改变山河的功迹。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科学使人更聪明。雷北大队生产大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1982年为例，粮食平均亩产1064斤，棉花平均亩产172斤多，创历史最高纪录，总收入127万元，比1978年的51万余元翻了一番多。社员收入倍增。新农村的建设也初具规模，有84户社员搬进了颇为舒适的新居，群众日子越过越富裕。这期间，他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抓政策，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是抓科技，提高干部、群众科技文化知识——他们的农民技校办得早，办得好，办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和有深远影响的经验，在全国引起了注意，前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我不止一次在他们的农民技校听过课，的确让人深思，让人兴奋。首先这里的领导班子有魄力、有智慧、有远见和有决心。基于对农村的非常深刻理解，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宝贵的实践，使雷北大队的干部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必须把培养各种人才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必须把智力开发当成基本建设来抓，当作大事来抓，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科技素质，建设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懂科学、懂技术的新型农

民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大队党支部对办学宗旨、学校制度、教师的培养、教学计划安排等等，都严格审查，反复实践，反复钻研，费尽了心血。在教学内容上，“从实际出发，与生产相结合”，既要重视基础知识，更强调为当前生产服务，效果好，很受群众欢迎。这样，经过4年艰苦努力，目前全大队已有近300人先后在农技校学习过，占总劳力的1/3强，有近百人被评为各类农民技术员，初步满足了生产发展的需要。

为了开发智力，他们不仅舍得下功夫，而且舍得下本钱。每年订阅20多种科技杂志，还购置了一些必要的仪器设备，在办农民教育方面，每年支出七八千元。近日，我参观了他们投资10万元建成的一座文化教育大楼，觉得在偏僻农村出现这样的新事物，使人激动，使人钦佩。

这里认真办学，科学技术地位高了，许多旧观念、旧习俗改变了。过去看人是看家庭出身，现在懂不懂科学技术，有没有真才实学，成了衡量人、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在这种尊重知识的气氛下，青年人上进心强了，全队近200名青年，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农技校的各种专业学习。过去不少青年想离开农村，现在争着上农技校，

当技术员。各级技术员不仅有适当的报酬，而且很光荣，受人尊重。

干部的技术状况也变了，更加知识化、年轻化了。过去，干部知识化程度差，指挥生产有盲目性。现在所有的干部全都经过农技校的学习和培训。这种巨大变化，对今后的农村工作，意义至为重大。

在雷北大队不仅学习科技知识蔚然成风，他们还注意改变耕作制度，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新技术、新成果，使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同时，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继续大力培养各种技术人才，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收入迅速增加。

如今，这里的干部、群众，正雄心勃勃地阔步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陕西省工农教育委员会等单位，把雷北大队办农民技校的情况编了一本书：《农民教育在雷北》，我写此短文，以表示欢悦的心情；并向农村的干部和群众推荐这有深远意义的创造性的新事物。

1983年5月于西安

致潘旭澜

——书信11封

由于从事杜鹏程小说的评论和教学工作，1978年底以来，我同他通过不少信。现从他给我的信中选录11件于此。

这些信，谈了对我写的东西的看法和意见，回答了我的问题。关于他的生活和创作，包括素材来源，人物原型，形象塑造，艺术构思，写作过程，修改情况等等，都或详或简地说到了。还就若干创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和同辈作家的相同相似及不同之处，漫

谈了他的见解。而这些大多未见之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我认为，对于理解他的小说和文艺思想很有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是有益的参考和启发。此外，有些信中由小说里的人物而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也有许多深刻、精辟的见解。

一个作家，胸怀坦荡、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重大成就而又虚怀若谷，有远见卓识却乐于倾听读者意见，就更令人钦佩。尤其是，对一个普通评论工作者议论他名著的不足与缺点，非但没有一点不高兴，而且十分热情地欢迎和听取，并真诚地支持公开发表和出版。这种态度和思想境界，使我感动和深思。我想，只有将自己的创作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部分，对人民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才能够这样。它为文学界恢复和发扬健康的新风尚，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不少信中谈了对书稿的意见，指出了它的缺点、不当和浅陋，我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尽可能作了修改，少数地方只好一仍其旧。至于那些肯定和溢美之词，我觉得这是在评论颇受某些同志所鄙薄的时候，对评论工作的热情支持。他一向认为，创作和评论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对于这些写给个人的信件，我想读者是不会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待、要求它们的。唯其是写给个人的信，所以比较随便，不事润饰，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其性情。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信中提到的人物原型的姓名、单位，用××代替。

潘旭澜记

1978年12月20日信

旭澜同志：

你12月16日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评林彪、“四人帮”对〈保卫延安〉的围剿》，我们这里的同志争相阅读。我没订《文汇报》，《延河》编辑部的同志连忙把文章拿来让我看。可以想到，这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写成的。如果对作品没研究和不熟悉情况，要写出这样热情有力的文章，恐怕不容易。论述作品缺点的部分，我都摘录下来，以供思考和学习用。

我现在正紧张地修改《保卫延安》，因为要很快重印，不可能大动，但能改进的地方当尽力改进。你在文章中说，书中关于彭总，文字上有一些欠确切之处。但没有详谈。我希望你写信把你在这方面的意见仔细而无保留地告诉我，以便

进行修改。盼复。

敬礼！

杜鹏程

12月20日

1978年12月22日信

旭澜同志：

我写好信还未发走，又接到你的信及所邮报纸。胡采等同志回来说，他们在上海看到你。现在真是搞得很狼狈，人民文学出版社月底就要付印《保卫延安》，他们的计划是：4月底印出来，5月1日和读者见面。这一来，我能支配的时间只有8天，这月30号一定要把稿子交给他们，真是遗憾得很，我有许多想法，只好等待将来了。我请求你把有关描写彭总的地方，那怕是一字一句的不妥都指出来，立刻给我一信，以便进行修改，迟了就跟不上了。如何？

因为你对情况熟悉，对作品有研究，而且搞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因而才能那（样）快的写出这篇文章。不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即使怎样用劲，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搞出这样洋洋洒洒的大文，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客气。

现在顾不上说别的，单等你的来信。我爱人